

解锁“新中国第一居”的治理密码



(上接1版)

1949年12月1日,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全市发出《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》,对居委会的性质、生产方式、职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。

在上羊市街老居民的记忆里,那时的居委会干得工作可不少。比如,个别居民卫生习惯不好,陈福林和居委会一班人商量,盖了两间简易公厕;国内一些地区遭受洪涝灾害,居委会干部就挨家挨户去募捐;抗美援朝,陈福林去慰问军烈属,动员青年参军报国;晚上的时候,治安不好,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都会外出夜巡,等等。

锣、喇叭和微信群

金水德今年75岁,一米七的个子,身材偏瘦。自从退休后,他就投身社区工作,不仅成了居委会委员,还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。

记者采访他时,他正忙着在国庆节前夕给社区的老人分配过节物资。只见他一手拿着名单表格,一手帮大家搬物资。社区里的老人大多与他相熟,见到他都会情绪饱满地说一句:“老金,谢谢你啊。”

如同小时候父母描述陈福林的那样,如今,“热心肠”也成了金水德在社区里的代名词。

金水德说,从小时候看隔壁的叔叔阿姨参与社区工作,到现在自己也成了居委会一员,几十年里,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基层民主自治在“新中国第一居”的生根发芽。他用三个物件——锣、喇叭、微信群形象地讲述了其变化发展。

锣,是金水德幼时的记忆。那时候,他每次在家里听到锣被敲响了,就知道是居委会的人来了。他们有时候敲锣,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、关好门窗;有时候,是告知大家垃圾车来了,提醒大家下楼丢垃圾。“那时候的锣,主要是起通知的作用。每回居委会敲着锣过来了,大家就知道有要紧的事情了。”

喇叭,是20年前金水德刚退休从事社区工作时经常用到的工具。那时候,碰到社区打疫苗或者进行卫生检查、安全检查等,金水德总会拿着喇叭走街串巷喊一遍。“那个时期,开始主动反映问题的居民是越来越多了。”金水德回忆说,“我拿着喇叭走街串巷,居民知道我来了,会探出头来顺便反映自己生活中碰到的问题。”

他记得,为了最大化地收集民意,2005年左右,社区在每个楼里设立楼道长,方便居民就近反映问题。到了2009年,社区还设立了邻里值班室,由社区里比较有威信的居民轮流值班,接待需要反映问题的居民。“那时候啊,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矛盾和邻里间的矛盾纠纷上。”金水德说。

现在,微信群正成为金水德亲密的“朋友”。“手机功能越来越多,社区、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也更加便捷。你看,居民碰到什么问题,随手一拍发到微信群里,我们就会安排人过去帮忙处理。”金水德说。更让他感受深刻的是,如今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,“反映的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‘小家’方面,而是更加关心社区这个‘大家’,比如看到绿化带被破坏、垃圾随便扔,他们都会及时在群里反映。对社区治理有何意见建议,也会发在群里。”

铜像对面的“民意小圆桌”

时过境迁。在79号院陈福林铜像对面,开着一扇门,



上羊市街社区居民委员会



居民议事场景



还原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现场场景的油画



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陈列的保甲章

基层民主自治能发挥出多大的力量?在上羊市街社区走访过程中,有一个细节令记者最为深刻:无论社区工作人员走到哪里,路上的居民都会像看到老熟人一样,热情地跟工作人员打招呼。

这份熟络,与上羊市街社区从“邻里”中生长、萌发出的自治活力紧密相关。“社区的事,大家议、大家管、大家办。”社区里几乎随处可见的议事桌子,每年100多场关于社区治理问题的激烈讨论,都是上羊市街做好民事共谋、提升社区自治水平的载体与努力。

基层民主自治,就是让普通居民有地方发声、有权利决策,这不仅是让社区内部关系更“铁”的关键,更是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的“法宝”。其在基层治理中输入的“密码”,或许可以概括为简单的一句话:普通人的愿景,就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。

